

濠上漫与

# 贺《全宋笔记》出版十编

■陈尚君



到今年上半年,《全宋笔记》出版十编,102册,总收477种宋人笔记,确实可喜可贺。该书在上世纪90年代末启动论证时,我曾参加。2003年第一编出版,在上海师范大学开发布会,我也曾忝列。当时估计,全书还需六七年时间方能完成,事实则历时超过15年。从启动至今,恰好19年,也就是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时间。真正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大规模文献整理,确实急不得。

《全宋笔记》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负责编纂,前后期分别由朱易安教授与戴建国教授领衔,傅璇琮先生列主编之一,并撰写全书前言,由河南教育出版社改名后的大象出版社出版。

坦率地说,在《全宋笔记》论证时,我并不同意。那时我已完成《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对一代文献之汇编校录有特殊的感受。今人说诗文,对各自的文体特点和彼此界限,似乎并不会引起混乱,但将一代几百年间所有作品堆在你面前,就会发现有大量诗文之间的作品存在。诗词之间的界河,也到宋代方分明,唐代几乎没有办法分切。笔记的边界就更模糊了。虽然习惯有笔记小说、野史笔记的提法,但在古籍分类上并未列此一项。要将一代笔记收齐,似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一编出版时,读到傅先生执笔的前言,忽有感悟。要想如清人所编全唐诗文那样,标榜将宋

人笔记没有遗漏地收齐,当然决无可能,但在《全宋笔记》大题目下,将存世宋人笔记作一次系统的调查和整理,难道能说没有学术价值吗?就此而言,《全宋笔记》的课题成立,体现了圆融的学术精神,即不故悬高格,而是降低身段,考虑到全书成于众手,提出所有执笔整理者都能理解、执行、完成的学术目标。具体来说,我看到有以下几点。

一是为宋人笔记瘦身。规定主旨明确的专书不收,因而将诗话、语录、谱牒、题跋等类书均排除在外。

二是以有专书传世者为整理重点,已亡逸的书一般不收,也不将笔记辑佚作为非完成不可的任务。

三是全书大约照顾到时代先后,但并未严格限定,而是完成一批,出版一批,既照顾到项目的推进,也让参与者可以因成果之发表,得到应有的学术承认。最后几编中,仍有一些北宋乃至宋初的著作编入,虽未严格遵循先后之序,因各书

相对独立,并不影响读者之阅读。

当然,对每项规定,各人见解会有分歧,但一经确定,坚持贯彻始终,方有全书之完成。恰如傅先生领衔的另一部书《全宋诗》,初定体例即规定普查先完成《宋诗纪事》引及之书目,总集、笔记一般援据通行本,每一首诗只记录一个文本而不是会校各本,看似学术定位不高,但基本班子是刚毕业的学生,各重要别集又外约各地学者,唯如此方能保证最后完成。对《全宋笔记》,我也作如是观。

我因近年作全部唐诗的校订,得以披览《全宋笔记》所有各书,读到许多前所未见之书,常见书也看到后出转精者,如《夷坚志》《桂海虞衡志》都有许多新的佚文补入,如《昭德新书》以往仅见四库本两卷,此次据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增入第三卷。类似例子太多,说明整理者做过很好的文献调查。当然,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仍有。有些是无法要求整理者皆加解决的。比如我校唐诗,见

宋人笔记中凡提到唐人诗者即全部录出,逐一查证是否佚诗,是谁的诗。一查方发现,宋人凡引不知作者的好诗好句,就径称唐诗。现在查证方便,知大多为宋人诗。这是笔记原作者之错,整理者如能指出,当然最好,无法逐一指正,也应原谅。

作为社科重大立项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大型古籍整理和出版项目,《全宋笔记》已圆满完成。出版社还考虑出版电子版和网络版,也是好事。作为宋人笔记之系列工程,希望整理者和出版者仍持开放态度,能作进一步的后续工作。

成于众手,水平高下不齐在所难免。如出合订本或新编本,希望将已发现的错误有所纠改。如最后一册据元陶宗仪《说郛》选录五十九种笔记,兼取商务印书馆排印张宗祥校定百卷本和明末清初的宛委山堂本一百二十卷本,收入四库的也是宛委本,其实后者包括大量后出伪书,似与陶宗仪已没有什么关系。稍作翻检,相信如《玄池说林》《三余帖》《内观日疏》《嘉莲燕语》《继古丛编》皆为伪书。校改之细节出入,偶有所见。如《先公谈录》原文“杨公徽之”,删去“之”字,似忽略了《宋史》卷二九六有《杨徽之传》,杨亿为其撰行状,苏颂为其撰墓志。同书录王彦威诗,既云“正是酬防报国时”,又云“粗官到防是男儿”,两个“防”字皆属排版时失校,前者当作“恩”,后者当作“底”。《野

人闲话》“蜀主能文章,尝为箴诫颁诸子”,校云“诸子”商务本作“字人”,据宛委本改。其实此间述蜀主孟昶颁诫各郡县守令,有“尔俸尔禄,民脂民膏”语,“字人”不误,“诸子”误。

全部宋人笔记,肯定不止477种,希望有人作一总目,备记存佚。就我所知,如《名臣言行录》《宋朝事实类苑》《三朝北盟会编》中仍有大批宋人笔记可供辑佚。香港已故学者阮廷焯,曾在《大陆杂志》等刊物发表宋人笔记数十种辑本,如郑熊《番禺杂记》、李丙《丁未录》、马永易《元和录》、佚名《谈选》、孙宗鉴《东皋杂录》、贾似道《悦生堂随抄》,皆为《全宋笔记》所未收。

另,作为《全宋笔记》的延展,《全宋诗话》《全宋语录》《全宋题跋》一类书,仍有编纂的必要。欧阳修早就说过,诗话是为了“录以资闲谈”,就是诗的笔记。今人研究诗话者多,但至今尚无全部宋人诗话权威优质的校订本,也是事实。举例来说,从明清诗话丛编中的严羽《沧浪诗话》,到最近60年郭绍虞、张健的两次校解,基本文本发生巨大变化。已有的《宋诗话全编》,只是仓促的宋人论诗语的堆垛,不足让学者信任。再有语录,是最典型的笔记。如《朱子语类》,众多学生记录一代大师混杂村言俗语之讲学,难道不是笔记吗?宋代理学家和禅宗僧人所作尤多。题跋更是最鲜灵活泼的笔记。当然,这些都已非《全宋笔记》的任务,是新的重大选题了。

基本文献建设是付出艰难而完成不易的文化积累工程,为此应向《全宋笔记》的整理者和出版者致敬。

(上接第一版) 她的译稿全部手写在方格纸上,一个个楷体字在方格纸上清晰可鉴,看她的译稿简直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个别有错误的地方,文先生也会用刚才提到的办法加以修改。文先生的译稿绝不会出现大段的删改和涂抹之处,如果出现大段的改动,她宁可重写,也不会破坏稿件整体的美观。我觉得文先生如此认真,一定是在为编辑着想,不想增加他们的工作量。我真为文先生的编辑们感到庆幸,拿到这样的稿件,不仅效率提高了很多,而且这个过程也应该是赏心悦目的。

## 真情

文先生的“真”,也是对爱情的“真”,对祖国的“真”。这在她多次为我题写的赠语中可见一斑。

《北京城杂忆》是萧乾先生回忆老北京风俗文化的杂文集。冰心先生对文先生编的这本集子有极高的赞誉:“读了萧乾的《北京城杂忆》,他那流利而俏皮的京白,使得七十年前的北京城的色、香、味顿时萦绕而充满了我的感官,引起我长时间的含泪的微笑。”

我珍藏着两本《北京城杂忆》,文先生为此分别题赠了两句“萧乾语”:

其一: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一座城市也该有它的市格。

其二:我想用秃笔唤回北京市民的荣誉感,唤回东方人的尊严。

看着文先生的题词,我又一次陷入沉思。萧乾先生的文章立足于城市精神建设和当代市民生活,是在呼唤城市的灵魂和

品格。如他对于随地吐痰的批评,对于乱丢垃圾的痛斥,对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体贴谦让消失殆尽的惋惜等,都体现了萧乾先生对于新时代北京城和北京人的思考与关切。文先生的题词,则言简意赅地把《北京城杂忆》的精髓写了出来。

萧乾和文洁若两位先生是夫妻中的典范,他们的爱情让人羡慕不已。文先生的《我和萧乾》讲述了他们相知相爱、相濡以沫的经历,《一生的情缘》则是她专为纪念萧乾百年诞辰而著。萧乾先生已去世20年,文先生的客厅仍摆放着萧乾先生不同时期的照片以及他俩的合影。

文先生以“萧乾语”题词,更是体现出他们身为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文化的一片赤诚和真意。

在《书评·书缘·书话》(萧乾、文洁若著)中,文先生题词:

书评家须是一个关心、护卫、促进文化的人。

萧乾先生早年一直被英国剑桥大学聘用,却执意回国。回国后,剑桥大学又专门派人来请,几次三番,萧先生丝毫没有动摇的心思。读文洁若著《我与萧乾》得知,回国后,夫妇俩在那个特殊年代曾蒙受冤屈,备受折磨。但即便如此,萧乾先生从未后悔留在国内。一次,萧乾先生以极端方式进行抗议,文洁若先生脱口而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要是1949年去了剑桥,这17年,你起码也是个著作等身的教授了。绝不会落到这步田地。”听到这样的话,萧乾先生带着凄厉神色,加重语气说:“想那些干吗!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接受中国人的命运。”萧乾先生是从骨子



里深深地爱着他的老北京,爱着中国,爱着中华文化。正是这样的信念,才支撑他后来写出《北京城杂忆》《老北京的小胡同》等经典篇章。

萧乾先生去世后,文先生也有机会定居国外,但她执意不肯。她要在曾与萧乾先生生活过的老屋不停写作,直到写不动的那一天。文先生从未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但她以坚持翻译写作在身体力行地表达着对祖国、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在萧乾先生、文洁若先生合作翻译的《尤利西斯》中,文先生为我题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八个字,应该是大有深意的。

在《萧乾散文》一书中,文先生题写道:“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萧乾语,文洁若录。”萧乾先生的这句名言和巴金

的“讲真话”,不知滋养了多少后来人。萧乾夫妇当年因为讲真话而饱尝辛酸,近年已年迈(当然她决不承认)的文先生又因真诚而几次被人蒙骗,比如有的出版社出版她的译作不仅不给稿费,连样书也不寄。可是文先生也未予计较,很多时候只是一笑了之,因为文先生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没有心思考虑这些琐事。文先生如此郑重地题写这句话,可见“真”在她心目中的分量之重。

文先生就像阳光可以驱散黑暗和寒冷,如清风可以吹走尘埃和肮脏,似清泉可以洗涤污垢和泥淖。和文先生的交往,欣赏文先生的每句题词,都是一种滋养和熏陶。作为后学,我敬佩前辈的学识,也仰望他们的性情和品格。